

# 从哈佛看巴以问题：在校园和田野之间

段九州

当初次接触美国的中东研究时，我常常惊叹于这个国家对中东问题的热忱。不仅冷战中期以来历届美国总统都把中东和谈作为外交政策的重点，而且美国几乎各大高校都设有中东研究项目，出产的学术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为什么美国人这么重视中东问题？事实上是因为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区域的问题与美国的国内政治和对外政策如此紧密关联，尤其是在“9.11事件”之后。笔者于2015年至2016年在哈佛大学访问期间，由于各种机缘巧合接触到哈佛校园里的“巴以冲突”，以及参与哈佛的调研团前往巴以地区进行实地考察。本文希望通过作为“外来者”的观察体验过程来管窥美国与巴以问题的关系。

## 一 校园：巴以问题作为美国“内政”

中东问题的核心是巴以问题，对强势盟友以色列的支持和对弱势小国巴勒斯坦的支持成为美国民众政治立场的试金石。一部分美国人认为，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不可替代的忠实盟国，美国应该不惜一切代价维护以色列的利益和立场，他们背后的支持势力是美国强大的犹太财团和坚信“犹太人必须返回圣地”的基督教保守团体。

另一部分美国人认为，以色列的存在是非法侵占巴勒斯坦人的土地，是对弱势民族的霸凌和欺压，美国应该维护国际法尊严和帮助

---

[收稿日期] 2021-09-30; [修订日期] 2021-12-30。

[作者简介] 段九州，男，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国家为埃及和土耳其。

巴人取得自身合法权益，他们是坚信“公正和平权”普世价值的各阶层民众。我当时在哈佛见证的一场关于巴以问题的争执，正是美国两种价值在校园中的缩影。

2015 年 11 月，著名国际律师事务所米尔班克（Milbank）撤销了对哈佛法学院的资助，原因是哈佛法学院学生将他们的捐款用于举办了巴勒斯坦相关的活动。在 2012 年，米尔班克律师事务所向哈佛法学院捐赠了 100 万美元，条件是法学院在外宣材料中确认该事务所是资助方。在 2015 年 10 月，有上百名哈佛师生参加了名为“言论自由的巴勒斯坦例外”的午餐会，其中组织活动的学生用米尔班克赠款的 500 美元购买了披萨和其他食物。

据称，米尔班克律师事务所中有几位正统犹太教合伙人，他们得知此事后决定将捐款从学生活动转移到哈佛的其他法律项目中。这件事情在 2016 年 2 月由哈佛校报《哈佛红》（The Crimson）爆出，一时引起轩然大波，哈佛校内展开了关于巴以问题的大辩论。

事实上，哈佛的校园政治氛围长期倾向左派。在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的上个世纪 60 年代，哈佛曾多次爆发抗议越战、争取民权的学生运动，他们极力反对美国政府对大学事务的干涉，标榜自身独立思考的权利。学生运动最后走向极端化，连与美国政府有合作项目的教授都被哈佛学生烧屋毁车，政府被迫出动军警平息了混乱。

而 20 世纪 60 年代的学生运动对后世影响深远，它奠定了美国当代政治中“理想主义”的一面，即美国人必须走向更加公正和平等的社会，投射到全世界也是如此。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和现在当红的民主党议员桑德斯都曾以不同的身份参与了 60 年代学生运动，也是运动思想的继承者。

事实上，在上世纪 60 年代，全世界的学生运动大多都跟第三世界国家争取民族独立有关，哈佛的学生也深受这股浪潮的影响。以萨特为首的法国知识分子，支持学生抗议法国政府继续占领阿尔及利亚，最终推动了戴高乐总统决定从阿撤军并允许其独立。同一时

间在世界各地发生的学生游行集会很多也带有支持民族独立的口号。因此，支持民族独立成为左派知识分子和学生反对霸权的重要标志之一。而在大部分当时的殖民地国家已经成功独立后，至今仍属于被占领土的巴勒斯坦逐渐成为左派的精神图腾。在美国各大高校都不乏巴勒斯坦的师生支持者，单在哈佛校园内，我就发现了数个支持巴勒斯坦事业的组织。

上文提到的安排法学院支持巴勒斯坦活动的组织叫做“还巴勒斯坦公正”（Justice for Palestine）。在2000年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举行“第二次起义”（The Second Intifada）之后，一群哈佛法学院的学生认为校园内缺乏关于巴以冲突的讨论，并担心师生可能存在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根本性误解，因此成立了这个组织。在官网上，他们明确提出，组织的目的是用世俗、人性和法律的手段讨论巴以问题和宣传巴勒斯坦人的权利。



图1 哈佛学生在校园内抗议以色列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哈佛另一个校级的支持巴勒斯坦的组织叫做“巴勒斯坦团结委员会”（Palestine Solidarity Committee, PSC），成立于2002年，旨在支持巴勒斯坦人“争取命运自决和平等的斗争”。他们相信，只有当巴勒斯坦人命运自决和平等的权利被保证时，巴以中间的最终

和平才能实现。在官网上，他们列出了实现巴人这两项权利的先决条件：第一，以色列停止占领约旦河西岸、加沙和东耶路撒冷，并拆除隔离墙；第二，赋予以色列籍的巴勒斯坦公民平等的权利；第三，巴勒斯坦难民有权返回他们的家乡。

他们在大波士顿地区颇有影响力，除了邀请哈佛和周边名校的教授等演讲之外，如邀请麻省理工学院（MIT）著名教授诺姆·乔姆斯基，还经常组织周边左派民众参加声援巴勒斯坦人的活动。由于哈佛和波士顿地区对左派自由活动的整体包容，他们偶尔还会举行小规模示威活动。《哈佛红》曾报道，在 2014 年春季学期时，哈佛的巴勒斯坦学生和同情他们的学生在哈佛校园到处寻找 SodaStream 饮料公司标志的贩卖机，企图破坏，因为该公司支持了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点的建设，害得哈佛校园被迫移走了所有该公司的贩卖机。

相比支持巴勒斯坦的零星势力，美国国内支持以色列的组织更有经济和政治势力，他们背后往往有犹太大财团撑腰，不乏针对高校亲巴势力的反制手段。在 2001 年沙龙上台和第二次巴勒斯坦人起义爆发后，美国大学中对以色列的批评增多。以色列游说集团开始努力“夺回校园”。2002 年 9 月，两位新保守主义者马丁·克拉默（Martin Kramer）和丹尼尔·派普斯（Daniel Pipes）建立了“校园观察”（Campus Watch）网站，公布了一份可疑学者名录，鼓励学生举报反以言论或行为。

已故的巴勒斯坦学者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生前任职于哥伦比亚大学，因此哥大成为亲以势力的重要攻击目标。哥大前教务长乔纳森·科尔（Jonathan Cole）说：“爱德华·萨义德一发表任何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公开讲话，我们都会收到数百封电邮、信件和报道，要我们谴责萨义德、封杀甚至解雇他。”

美国的犹太集团甚至要求国会建立相关机制，监督教授关于以色列的言论，取消对“反以”学校的联邦资金。但此举未能成功。犹太慈善家还建立了犹太人研究项目，增加校园中的亲以学者。游说集团最强大的武器就是指责对方反犹（anti-Semitism），质疑以色

列的行为、质疑犹太集团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甚至谈到“犹太游说集团”这几个字，都会被指责为反犹，而反犹是令人憎恶的，没人愿意被戴上这顶帽子。

对巴以问题的态度是每位美国总统候选人的必答题，它俨然已经成为测量后者对国家忠诚度的标杆。然而很少有美国人去思考和讨论为什么巴以问题对美国如此重要。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斯海默和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在《以色列院外游说集团和美国对外政策》一书中得出的结论是，游说集团不喜欢媒体就关于以色列的问题展开公开讨论，因为这种讨论将让公众质疑美国为何给以色列那么大的支持。

由于主流媒体被犹太财团把控，亲巴力量被迫把舆论的战场转移到高校，或者因为这里是美国为数不多可以不受犹太资本影响的地方，至少校方守住了“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基本底线。就在米尔班克律师事务所撤销对哈佛法学院学生活动资助的当天，法学院学生办公室宣布将为他们提供需要的资金，让学生们可以继续“胡闹”。

## 二 田野：巴以问题作为美国的“外交”

与美国国内争论相比，巴以问题更是美国重要的外交问题。美国毫无保留地在国际舞台上支持以色列的姿态已经成为其经年已久的政治正确。美国不仅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也在地区事务中为以色列站台。当然，美国如此“偏袒”以色列离不开后者常年对美国社会的游说工作。以美国高校为例，每年一度的春假旅行（Spring Trek），美国各大高校的学生都会受邀组团前往以色列考察。怀着对巴以问题的兴趣，我在2016年3月也报名参加了哈佛K学院前往巴以地区的考察团。

这次活动由K学院的以色列同学组织，他们来自不同的职业背景，

有军人、律师、政治家以及创业人士。在他们的精心安排下，我们这些来自全球各国的同学在短短 8 天内，行走了特拉维夫 - 雅法 - 阿什杜德 - 内盖夫沙漠 - 马萨达古城 - 死海 - 耶路撒冷 - 拉马拉 - 北部基布兹 - 戈兰高地，几乎环绕巴以地区一圈。毫无疑问，除了让我们领略自然和人文风光之外，以色列组织方也希望这群国际人士加深对巴以问题的“理解”。

我们离开特拉维夫后最先抵达埃雷兹（Erez）边检站，这里是加沙与以色列和西岸之间唯一的陆路过境点。以色列军方的讲解员试图给我们呈现的是基础设施和设备的先进性，以及以色列在巴以冲突中遭受了多少来自加沙的火箭弹袭击。此刻身处边检大厅的我们，突然看到了一名坐在轮椅上的巴勒斯坦老人从对面的边检口缓缓驶出，而在一旁盘问的以色列士兵则全副武装。强弱立见的当下，以色列讲解员只能尴尬地补充道：“以色列会允许一些在加沙无法医治的疑难杂症病人前往以色列就医。”

当进入构成埃雷兹过境点内部的一系列灰色混凝土走廊和旋转门时，我们能清楚看到英文、希伯来文和阿拉伯文的标志，上面写着“加沙”，一个箭头指向我们的左边。最初的通道是一个封闭的走廊，一次只能容纳两个人。紧随其后的是一个长长的废弃仓库，房间中央有旋转门。这加剧了一种不祥的感觉，在安全摄像头的监视下，人可能会陷入这个想要迷惑“入侵者”的荒凉迷宫中。



图 2 埃雷兹过境点的指示牌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在从死海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两旁丘陵上鳞次节比的以色列定居点渐渐进入视野。不知道是否猜到了大家心中的疑问，同车的以色列律师同学居然主动讲起了自己作为定居者的故事。“我曾经住在耶路撒冷老城的一个大房子里，但久而久之，我无法接受的是，每天早上醒来就会想到这个房子在一百年前曾经属于另一个阿拉伯家庭。于是，我决定搬出老城，到周边的郊区（巴勒斯坦西岸地区）修建了我现在的新房子。”一个接受西方精英教育的律师为自己违反国际法修建定居点的行为辩解，没有什么比这个场景更能体现当下的巴以冲突了。相比巴勒斯坦人，以色列当局能够用成熟的司法系统取代武器和大炮，确保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的统治地位。

根据以色列法律，1948年房屋被占领的巴勒斯坦耶路撒冷人被视为“缺席者”<sup>①</sup>，对其财产没有合法要求，但能够证明房屋为犹太人所有的以色列犹太公民确实有追索权。这意味着与国外有联系的资金充足的定居者组织也可以要求拥有这些财产。在美国注册的定居者组织经常以该市巴勒斯坦社区的房屋为目标，利用缺席财产法，而且经常使用虚假文件强行驱逐居民。而去年5月巴以冲突的暴风眼谢赫·贾拉（Sheikh Jarrah）社区正在经历着类似的情况。该地区绵延在一座小山上，遍布外交使团以及联合国和非政府组织办事处，多年来一直是定居热点，很多以色列人甚至海外犹太人都希望根据缺席财产法搬进这一地区的巴勒斯坦人家中。

---

① 按照1948年12月以色列颁布的《缺席者财产法》，缺席者被定义为1947年11月29日到1948年5月19日，即联合国《巴勒斯坦分治决议》通过到以色列宣布建国期间，所有在以色列境内合法（直接或者通过代理人）拥有财产的外国（黎巴嫩、埃及、叙利亚、沙特阿拉伯、约旦、伊拉克、也门等国）公民，所有在1948年9月1日之前离开常住居所的人，及所有阻止以色列建立及与以色列作战的人。《缺席者财产法》是以色列政府有效剥夺阿拉伯土地的措施，一旦被认定为缺席者，其所有财产都由缺席者财产托管机构剥夺。见王宇著，《以色列阿拉伯人：身份地位与生存状况（1948-201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53页。



图 3 耶路撒冷郊区的定居点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从耶路撒冷进入西岸，地貌并未出现大的变化，而民居建筑比较明显的特征是每栋楼顶的巨型储水桶，凸显了当地缺水的状况。此行的目的地是一个名叫拉瓦比（Rawabi）的在建新城，它是第一个在分散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建造的城市，由巴勒斯坦裔美国企业家巴沙尔·马斯里主持修建。该新城位于拉马拉附近，计划入住 2.5 万到 6 万人，城中伫立的大型巴勒斯坦国旗彰显了该项目的“民族雄心”。然而，即使拥有现代化的建筑技术和大量的海外投资，拉瓦比新城和西岸的其他居民楼一样面临着缺水的难题。原因在于以色列控制整个约旦河西岸的供水，大约 80% 来自以色列国家水资源公司（Mekorot），另外 20% 来自瓶装水。拉瓦比新城横跨 1993 年奥斯陆协议规定的西岸的 A、B 和 C 区，其中 C 区完全由以色列控制，而连接拉瓦比的水管穿过 C 区的一小部分。

以色列政府最终推迟了 18 个月才让自来水进入拉瓦比城，这对巴沙尔·马斯里和他的投资者来说是沉重的代价。数以百计的新拉瓦比公寓买家退出，开发商为了获取用水许可证而浪费了数百万美元。在 2015 年美国和以色列就伊朗制裁在华盛顿举行的会谈中，亲以色

列的说客告诉内塔尼亚胡，他需回应国会和奥巴马总统关于拒绝向拉瓦比供水的担忧，因为大约 20 名美国参众两院议员访问了拉瓦比。在以色列游说者的压力下，内塔尼亚胡最终默许了向拉瓦比供水。



图 4 建设中的拉瓦比新城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 结语

从波士顿飞抵特拉维夫的当天，我和同伴都在感慨：“这里其实看起来和美国没有太大区别。”我们在特市见到了国际组织、政府官员、新闻记者和科技创业群体，他们可以用完美的英文与来访者交流，仿佛这里是另一个硅谷。只有稍显慵懒的早晨和路上偶遇的战争危房能让人感觉自已身在中东。就连以色列人自己都说特拉维夫是一个“气泡”（Bubble），与几十公里之外的加沙，甚至耶路撒冷都宛如两个世界。然而，实地考察的意义正在于打破“气泡”，即使组织方努力把整个行程都打造得堪称完美。在考察收尾阶段的交流会上，曾经在校园里因为巴以问题分为两派的学生居然惊人地达成了一致，那就是自己肉眼所见的无处不在的冲突感和强弱格局。甚至连作为组织方的以色列同学也承认，这是一场难以结束的游戏。

责任编辑：高良敏

文字审校：董 慧